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

总主编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兵学文化名著

主编 雷 庆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学术思想空前发展的兴盛局面，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其后二千年来，虽然朝代兴替，世事沧桑，但中华文化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虽然也曾经过曲折，然而总体趋势却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许多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断涌现和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的屡屡诞生，便是使中华文化卓立于人类文明史的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背景下，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思想的渗透和浸润更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思想铸造了国人的灵魂，培育

了民族性格。

《论语》原是儒家先师孔子的一部言行录，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崇；汉代以后，从蒙童的诵读开始，成了读书人的“圣经”；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注释之后，便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论语》的生命力仍然不衰；就是到了现代，《论语》的发行量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版再版仍然是惊人的。其中的名句，仍然在印刷品里大量被引用。

何止《论语》如此，在中华文化灿烂的园地里，其它思想体系经过历史的考验与筛选，也各领风骚，连峰叠起。道家学说，至今仍使超然者愉悦；孙子兵法，千秋传诵；佛禅之道，信奉者不乏其众，秦汉之前就已吹响的要求变革的号角，一直或高亢或暗哑地回响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把中华文化推向了新的时代，变革思想对民族的觉醒与前进产生了巨大作用……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都在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感召着每一代人奋然前进。

思想文化与民族灵魂、民族性格的关系即然如此密切，自然引发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到底哪些书、哪些思想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最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最能渗入人们灵魂，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性格呢？1923年胡适之撰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亦撰写了《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等等。这些书目，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

参考。《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也是为对此有兴趣的学人比较集中地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意见。

延边大学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从塑造民族灵魂与性格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名著中，将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著作或全录或选其要按儒、道、佛、兵、法和神秘文化、性文化、帝王文化、处世文化、革新文化十大类别，集中编纂，加以作者简介、注释与简析，呈现给广大读者。这样分类，当然只是相对的，各卷之间有些交叉是难免的，命题也不一定都那么准确。例如“神秘文化”，近年来此类图书的出版虽然屡见不鲜，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界定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其中一些著作，宣扬迷信等消极层面如何加以分析与剔除，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讨论。然而考虑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此类著作在坊间的较大生命力与民间现实生活中的一定影响，在舍与存的选择上，还是以保留为较完整。再如“帝王文化”，本是政治文化之一种，其内容虽然大都是关于封建专制统治者治国御人之道的，然而它们的认识价值与经过分析之后的借鉴作用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此等等。每卷书之前均有该卷主编撰写的导言，对上述之问题有一定的分析，请读者留意之。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将是人类更加文明的新起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所当然要为此做出新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并分析中华民族灵魂与性格形成的渊源与脉络，对其精华部分发扬光

大，对于束缚我们民族前进的糟粕部分加以批判并摒弃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武装自己，放下包袱，重铸民族魂，再塑民族性格，大踏步地前进，从而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绵亘的山系，其宏富、深邃与复杂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态，随着历史的推行，自身也经历着一个发生、发展、碰撞、转变的过程。它对国人灵魂的影响与铸造更是复杂而多变的。它与历代统治者强化灌输、学者文人著作的感召与感染、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等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的编选主旨与方法，包括它所划分的类别、每一类别所选列的名著、对名著的注释与解析等等，当然只能是一种尝试，因为这是一项既有意义又相当困难的工作，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导与批评。

1995年11月

目 录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	张岱年	石 翔	1
导论	雷 庆		1
《孙子》	孙 武		16
《孙臆兵法》(节选)	孙 臆		41
《吴子》	吴 起		73
《司马法》			88
《尉繚子》	尉 繚		102
《三略》	黄石公		131
《六韬》			145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李 靖		195
《长短经》(节选)	赵 蕤		220
《太白阴经》(节选)	李 筌		239
《虎铃经》(节选)	许 洞		260
《武经总要》(节选)	曾公亮	丁度等	297
《何博士备论》(节选)	何去非		338
《百战奇法》			363
《纪效新书》(节选)	戚继光		452

《投笔肤谈》	西湖隐士	489
《兵𡔷》	尹宾商	514
《三十六计》		542
《间书》(节选)	朱逢甲	582
《曾胡兵法十三篇》	曾国藩 胡林翼	596

导 论

雷 庆

伟大的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这光彩照人、琳琅满目的文化宝库中，兵家文化的奇珍瑰宝尤为引人注目。

兵学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也有一个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我国，兵书的发展源远流长。其萌芽时期，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明人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中有兵法起源于黄帝的记载。实际上，此种看法并非始于明代，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黄帝时代创立兵法的说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便著录有《黄帝》十六篇，同时还著录有《神农兵法》一篇。这种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故过去一直有“黄帝为兵法始祖”之说。有些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黄帝所以能征服四方，统一天下，是因为得到宰相风后传授给他的《握奇经》，所以才娴于用兵，战则能胜。这种说法虽未肯定黄帝为兵法的创立者，但已肯定了黄帝时代已经有了兵法。《孙子兵法·行军篇》中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似乎也主张黄帝时代即有兵法。

上述记载，因无实际的文字依据，故尚难以确信。如必以实物和文献记载为根据，可以说兵书萌芽于殷商时期。许多文化史

的专家认为，在我国，书籍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了。《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里的“殷先人”，当为殷代早期。甲骨文将“册”字写作“𠔁”或“𠔂”，其状像是用绳子串连起来的竹木片——即后所称的简册。“典”字上半边，恰为一个“册”字，下半边的“廌”，很像是安放“册”所用的物体，即我们今天所谓的书案或书架。但是，“殷先人”这样的册典，因在考古发掘中未有发现，并无实物可证，故当时有无兵书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来了。我们说兵书的萌芽时期在殷商，主要是根据甲骨文有关军事的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军事与战争的记载很多。其中有些是占卜征伐用兵是否吉利，能否得到上天的保佑。如，一块甲骨上刻有：“己酉卜，贞：王正（征）𠔁方，受我又（佑）？二月。”意思是，“要去征伐𠔁方，上天保佑我们吗？”有一块甲骨上写着：“丁巳卜，贞：今夕𠔁（师）亡𠔁（祸）？宁。”有些甲骨上还刻有许多战利品的名称。有些甲骨还记录了方国之间的战争。有的学者认为，甲骨文是中国原始意义或初级形态的书。如果此种说法成立，其中记载军事与战争内容的甲骨文也就是萌芽状态的兵书了。近年来，有人就是根据这些甲骨文字，研究了殷商时代的军事制度、战争、兵器及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方国地理等。甲骨文之后的金文中，记载军事与战争内容者，亦当属于萌芽状态的兵书。

到了西周时代（约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专门的军事著作——兵书开始形成。这个时期的战争，其规模比过去要大，其战略战术也更为复杂。如公元前1122年的商周牧野之战便是如此。这次战争不但规模大，周武王还采取了战前用间，战斗中佯攻正面、迂回侧翼等战术，终于大败纣王，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军事制度进一步健全，兵器不断改进，战术也更为丰富。故此时期开始出现比较完整的兵书。这些兵书虽然我们今天已见不到了，但许多历史文献中对《军志》、《军政》等书的记载和引用，

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如《左传》、《十一家注孙子》等书都曾引用过《军志》和《军政》中的话。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左传·宣公十二年》：“《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引用了《军志》两段话：“《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军争篇》杜牧注）“《军志》曰：‘陈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势篇》注引孔氏语）唐代军事家李靖的军事著作中也引用《军志》上的话：“《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见杜佑《通典》）上述出自《军志》上的话，有些段落句式整齐，近于韵文，不像是西周时的文字，有些则文字古朴，可能为原书旧文。

关于《军政》的内容，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保存了两句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争篇》）“《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军争篇》张预注）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军志》、《军政》不仅是兵书，而且其军事思想已趋于成熟。

兵学文化的成熟为春秋时代。其成熟的标志当然首推《孙子》。从《孙子》的博大精深看，谓兵学文化成熟于春秋时代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我国的兵学文化，在历史上有长足的发展。其表现就是，兵学著作不仅质高，而且量大。那么，从西周到清灭亡的三千多年

中，共产生多少兵书呢？流传至今者又有多少呢？现在还无法说出确切的数字。有人统计，现今存世与存目的兵书约三千三百八十部，二万三千五百余卷，如果再加上已散佚不见著录者，中国兵书当在四干部、三万卷左右。

本世纪三十年代，一位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陆达节，在广泛搜罗历代公私书目的基础上，编著了《历代兵书目录》，共著录兵书一千三百零四部，六千八百三十一卷（内有二百零三部不知卷数）。陆氏认为，流传至今的兵书只有二百八十八部。1944年，陆氏又在他所编著的《中国兵学现存书目》改称古代兵书存世者为二百八十一部，一千九百三十五卷，内有不分卷及不知卷数者五十五部。但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今天存世兵书当有四、五百种之多。在这存世的兵书中，以成书于明清两代者为多。

中国兵学文化著作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凡是与军事和战争有关的问题，兵书中皆有论及。其中有些兵书是综合性的军事论著；有些是专门论述某一军事问题的；还有资料汇编性的兵书。概括说来，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主要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一、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

古代军事家们，虽不可能以科学的态度很准确地概括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但已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这一战争论中的首要问题，有些见解还相当深刻。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夏、商、周奴隶制时代的战争组织者，虽然对各自的战争有所认识，但主要是直观性的认识，尚未上升到理论，且战争动员时还不能不借助所谓“天”，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春秋战国以后，在不断总结以前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军事家们对战争的认识，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首先，从对战争起因方面的论述看，已经触及到战争发生的

根源。如《吴子》指出战争有五种起因：“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仇。”透过这五种起因的表象，人们不难看到统治阶级的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真实目的。

其次，从对战争目的的论述方面看，已提出了战争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别，“得道”与“失道”之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已经触到战争的本质。尤其可贵的是，古代军事家们进一步阐明了正义战争的目的。《三略·下略》指出：“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尉繚子·武议第八》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投笔肤谈·本谋第一》指出：“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又说：“自古明君贤将，谋之于未战之先者，岂专谋取胜哉？亦冀保民而康国耳。”上述这种以正义战争“诛暴乱，禁不义”，“以战止战”，“保民康国”的思想是正确而深刻的。

再次，从对战争的作用和后果的论述上看，古代军事家们已经认识到战争后果的严重性，主张慎战，反对持轻率的态度，并且已经认识到不同性质的战争有不同的后果。这种慎战的态度和把战争的性质与战争的胜负紧密联系起来的思想尤为可贵。《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全书第一句话便严肃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明确指出战争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必须认真对待。孙子的这种观点影响很大，为后世兵家完全继承下来，从而一致形成了视兵者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正如《投笔肤谈》所说：“凡兵之兴，不得已也。国乱之是除，民暴之是去，非以残民而生乱也。”古代军事家们认为，正义战争与不义之战胜负后果截然相反，正义必能胜不义。《三略·下略》指出：“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燭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之所以如此，正如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战争作为阶级的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产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以后的产物，它是用来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我国古代兵学家和军事家们触到了战争性质作用方面的有关重要问题，但他们尚不可能全面深刻地揭示战争的阶级根源。

二、关于作战指导思想与作战原则，即战略战术

这方面，是古代军事家最为重视、古代兵书论述最多也最为丰富多彩的问题，为古代兵家文化的主要精华所在。古代兵家的谋略也集中地体现在这个方面。

古代兵家都非常重视战争的谋略，“贵谋而贱战”，指出“勇怯在谋”，“兵不在多”，故强调作好战前的战略筹画，先谋而后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真正掌握双方的情况，即“知己知彼”，这是定谋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孙子提出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军事原则，这是一个具有超时空价值的普遍性的军事规律。

在军事战略上，古代兵家一般都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此理论首先是由孙子提出的，“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以实力为后盾，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它既是一种战略主张，也是战役、战斗的主张。从实行的手段看，孙子提出了两条，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孙子提出的战略策略，但是，他对“伐谋”、“伐交”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如何进行伐谋伐交，阐发不多，这给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发挥余地。

关于具体的制胜之道和战术方面，古代兵家的论述极多，其

内容十分丰富，难以尽述，诸如料敌察机、造势任势、兵不厌诈、出奇制胜、抗亢捣虚、因敌制胜、众寡分合、将权贵一、致人而不致于人、先发制人、后发制人、进攻速胜、持久防御、尽敌为上、兵贵机密，等等。许多兵书还深入地讨论了作战中的主客、攻防、进退、虚实、强弱、奇正等具体问题。

三、关于各种战法

中国古代兵书还大量地论及各种战法问题，诸如行军布阵之法、野战之法、城战之法、兵种战法以及特种条件下的战法等。

就行军和立营而言，古人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保持戒备，谨防陷入困境或遭意外打击，并准备随时投入战斗。《武经总要》说：“渡险则有发伏之虑，涉川则有壅决之忧，昼行则有暴来之斗，夜止则有虚惊之挠，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当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因此，行军立营必须持审慎态度。《武经总要》还提出，行军前必尽知敌方兵要地志和军事设防等各种情况。后来的各家兵书如此重视行军立营之法，实际继承了上古兵家的传统，孙子就强调“用乡导”、“得地利”，指出了各种地形上行军立营的原则和“相敌”之法。《司马法》也提出了“舍谨兵甲，行慎行列”、“行惟疏”的要求。所谓布阵，就是作战时的兵力部署和战斗队形。古人对此论述甚多，阵法有多种多样。从形式上看，主要有方、圆、曲、直、锐五种形态，其中最基本的是用于攻击的方阵和用于防守的圆阵。布阵之法，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火器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密集到疏散的逐渐演变的过程。古代的阵法虽已不适用于今天，但他们关于布阵的许多精辟论述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古代的“野战”、“城战”乃相对而言。古代战争行动，多数发生在野外，故野战的胜负往往决定战争全局的命运，野战战法从而也成为战争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战法。古人总结出了一系列

野战战法的主要形式，如包围、迂回、奇袭、伏击、邀击、夹击、突围以及正面攻击等。野战战法的根本特点是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孙子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能避之”，“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遇，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些都是野战中必须坚持的原则。

四、关于将帅与指挥艺术

中国兵家很早便认识到了将领的重要性，故将领问题也就成了兵书反复论述的题目之一。古代兵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将帅修养标准。《孙子》对将领的要求为“智、信、仁、勇、严”，认为将领不具备这五条便不能打胜仗。这五条，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官修兵书《武经总要》在论述将领标准时，也重申了这五条。在这五条（即“五才”）基础上，后来又有一些发展，如又提出将领的“五谨”修养，即“理、备、果、戒、约”。如何对将领进行考核呢？《武经总要》提出了“九验”之法：把考核对象派到偏远之地单独执行任务，以考验其是否忠于职守；将其留在身边工作，观察他对上级是否尊重，对左右是否谦恭；频繁地使用他，了解其才能；突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测验其反应能力和智谋；限期令他完成某项使命，观察他是否守信遵时；委托他管理财物，考验其是否廉洁；在危难之际注意他的气节操守；喝酒时，观察他是否举止失态；平日则通过其一言一行详加考察。

将帅修养问题在古代兵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内容上、要求上不同于文官修养，也不同于一般军官的修养，将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德才。在将德（或称“将道”、“武德”）方面，其核心是忠君报国，舍身为民；在将才方面，关键要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外，将帅还要注意个人性格上的修养及良好的心理素质。一个将领，只凭自身修养和操守还不能打败敌人，必须会带

兵，有谋略，掌握高超的指挥艺术。古代兵书都特别重视将领的谋略培养，强调“将在谋耳，不在勇”。

五、关于军队训练

军队训练，又分为练将与练士卒。练士卒由步法而伍法，最后到阵法。同时，还要训练步战、骑战、水战、山地战、火攻、守御、营阵、行军、行止进退、金鼓旗角等。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可谓这方面的专书。

六、关于军事法规

《尉繚子》中有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诸篇，专门论述军中的赏罚规则。宋代的《武经总要》则更为具体地提出了“赏格罚条”。到清代，又具体颁定了《八旗则例》、《军需则例》、《处分则例》、《工部军器则例》，使军中法规更为完善。

七、关于物资储备和后方补给

古代兵书一般都很重视军队的物资储备和后方补给，认为这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孙子》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李筌的《太白阴经》也说：“军无辎重，是举动皆缺。”兵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

八、关于军事地理

一些兵书，虽未专门论述军事地理问题，但对此都十分重视，并不同程度地论及这方面的内容。宋代的《武经总要》则以五卷的篇幅专题介绍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地等情况。

九、关于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历来皆受到重视。在中国古代，曾出现专论武器的著作，如南朝梁人所著的《铜剑赞》和《古今刀剑录》等，宋代的《武经总要》、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也有介绍武器的内容，并附以插图。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专门介绍火药与火器的兵书，如《火龙经》、《火攻契要》、《火龙神器阵法》等。由于古代的兵器对武器高度发展的今天已无多少借鉴意义，故本书一般未选入这方面的内容。

十、关于军制

许多兵书中都涉及到这方面问题。古代还出现过这方面的专著，如宋人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清代则有《皇朝志考略》、《钦定八旗则例》、《古代兵符考略》等。

中国兵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以上只是择其要者而言之，本书也只能择其名著而收之。

自古以来，兵家文化就广泛受到人们的重视。历代封建统治者，尤其是战乱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因为战争的需要，都访求和重用天下知兵的能人，并积极搜集兵书。宋代，还以官方名义，直接组织人力编撰兵书，宋仁宗赵祯曾亲自过问《武经总要》的编撰。宋代又以诏令的形式，颁定《武经七书》，将其作为考选军事人才的必试科目。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及有相当地位的封建士大夫，还争相为古代兵书作注，这样也推进了兵书的传播，扩大了兵书的影响。

内容宏富精深的中国兵学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简直是难以估量的，它曾哺育了一代代的众多名将，它曾指导了一次次胜利的战争，它曾造就过许多战无不胜的军队，它也曾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其他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